

第一章 移 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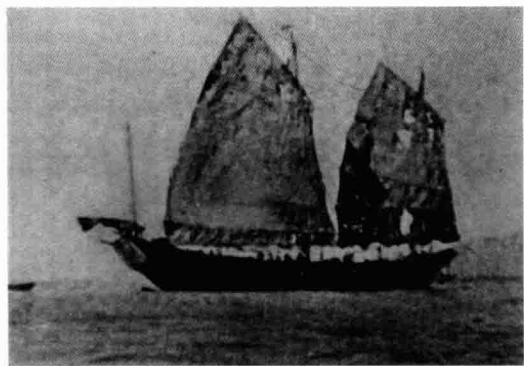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出国及地域分布

一、出 国

同安历史悠久。唐贞元十九年（803年）析南安县西南四乡置大同场，是为同安县之前身。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正式建置同安县。辖境包括今同安区、翔安区、集美区、湖里区、思明区、金门县及漳州龙海市一部分，至清末基本稳定。宋至清代，同安县隶于泉州（路）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两次隶于晋江地区和厦门市。1973年9月起至今一直隶于厦门市。1997年4月30日撤县改设厦门市同安区。2003年10月19日被划出东部五个镇（马巷、新店、内厝、新圩、大嶝）成立翔安区。

同安方言称出洋谋生者为“番客”。其实“番客”本来是指前来中国经商、传教或从事其他活动的外国人。番客一词自隋唐即有之。《全唐文》“卷七十五”载：隋唐时称大食、波斯等国来华的商人、旅客为番客。入宋以后，广州、泉州、杭州、宁波成为海上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大量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商人、传教士聚集在这些城市，有的定居下来。当时在泉州城南有供外国人聚居的区域，称为“番坊”。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在其《祈风文》中写道：“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来往交流逐渐增多，同安人把出国出境的乡人也叫做“番客”。在海外定居谋生的同安华侨自称“唐人”，回乡称为“回唐山”。

“华侨”一词的出现始于19世纪末，而普遍使用则在20世纪以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日本横滨的华侨创办学校，初次使用了“华侨学校”的名称。1906年，孙中山先生在他自己的一些著作中，也使用了“华侨”这个词。



20世纪初厦门海船

据《同安县志》卷卅六“人物录·垦荒录”记载，“同邑属海滨区，民生其间，多娴水性……冒险出洋，启荒远之区”，沿海渔民“经鲸波蜃浪之险，而无心畏惧”，所到之处“披荆斩棘，以扩利源，或开文化，或辟商埠”，^[1]但同安人最早出洋的年代和人物，目前有文字可考的是同安县盛乡安仁里新垵村（现属集美区）。《邱氏族谱》记载，元末明初（1370年左右），新垵村邱毛德等人远渡重洋“通番”，到了明朝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年），邱姓族人陆续前往马来半岛、吕宋和交趾（今越南）。汀溪乡《黄氏族谱》记载，明朝成化乙酉年（1465年），黄氏族人出洋，“终老卒

葬南洋”。《同安县志·列女》篇记述了明代蔡月湖女蔡氏其夫许元往吕宋谋生，王六娘夫陈台宜去安南（今越南）“经商”。汀溪乡是同安县的山区，早年交通不便，尚有人出洋，可见同安沿海一带，有舟楫之便，其出洋年代则应更早。据嘉禾里莲坂村《叶氏族谱》记载，其十九世至二十八世族人中，有79人前往东南亚各国各地区谋生，他们或长住异国，或卒葬他乡。其时间跨度大致包括清代和民国时期，分布范

围包括今菲律宾、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等国，其中有不少是商人。如第二十三世叶增任“往暹罗（今泰国），后购船旋归，卒于海中”，显属贩洋经商无疑。又据海沧石塘《谢氏家乘》记载，自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族人到东南亚及日本经商、谋生而葬身异国者，多达 337 人。据石塘《谢氏族谱》所载，清康熙至咸丰年间（1662~1861 年），其族人卒葬马来半岛的有：马六甲 15 人、槟榔屿 110 人、柔佛 4 人、丁加奴 13 人。同安的汀溪、马巷等乡、镇的陈氏和王氏族谱，也记述了清代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至道光四年（1824 年），先后有族人前往三宝垄和望加锡（今印尼爪哇和苏拉威西）等地经商，并终老“番邦”。此外，还有前往日本经商的泉州府同安县人蔡昆山，明末贸易经商，后于日本宽永年间（1624~1643 年）东渡长崎，康熙二年（1663 年）被任为长崎“唐船请人”。翌年 8 月病逝长崎。其后代均入日籍，从第二代到第五代继任“唐船请人”，从第六代至第九代担任唐通事，今在长崎本莲寺蔡家墓地保存有蔡昆山的墓碑。

明、清时代同安县族谱记载华侨出国年代及卒葬地点列表如下：

乡 镇	族谱姓氏	年 代	卒 葬 地
汀溪乡	黄氏族谱	成化乙酉（1465）	南 洋
大同镇	余氏族谱	崇祯乙亥（1635）	吕 宋
大同镇	陈氏族谱	乾隆壬午（1762）	番 邦
汀溪乡	陈氏族谱	道光辛巳（1821）	三吧垅
马巷镇	王氏族谱	嘉庆甲申（1824）	望加锡

新加坡同安会馆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 - 1619 年），就有同安人航海南下，“先至西瓜哇之万丹埠，嗣后到吧城及峇眼亚庇”等地垦荒经商，明末再移民马来半岛以种植业为生。清道光年间（1821 - 1850 年），有更多的乡人到安南、柬埔寨、暹罗、荷属印尼等地经商。海沧石塘村在明朝中后期至清咸丰年间，往南洋谋生而卒葬于当地的有 343 人，其中以侨居菲律宾、印尼、马来亚和暹罗为多。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于 1980 年对晋江地区自明朝成化年间至民国移居国外的华侨情况作了调查、统计，其有关同安华侨的统计见下表。

同安县族谱记载华侨出国人数统计表

人 数 年代	地 点	南洋	菲律宾	印尼	新加坡 马来亚	印度 支那	暹罗	其他
明嘉靖		1						
清乾隆		1	1	1	1			
嘉庆				3			1	1
道光		2						
咸丰		1			1			
同治		3						
光绪		2						

厦门岛是同安县的西南门户，葡萄牙人于 1516 年到达广州不久后即来厦门设立公行，进行商业贸易。其后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通过厦门与明朝政府贸易。天启年间（1621 - 1627 年），厦门已设有专营对外

贸易的“洋商”。郑成功父子在厦门拥有一支几十艘帆船的商船队。康熙九年（1670年），第一艘英国船驶入厦门港。五口通商以后，厦门的对外经济交流更为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国际大港口，厦门港的各码头，长期分别控制在同安陈、林、吴三大姓的地方势力之下。便利的海外交通，这是同安华侨产生的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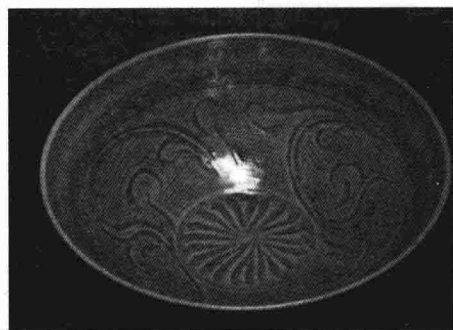
同安华侨出国原因，可以分为经商、垦殖、灾荒逃亡、政治流亡及契约华工等方面。

1. 经商、垦殖

同安县是福建省沿海县份之一，自古海陆交通较为发达，经济、文化繁荣。在日本出土的镰仓时代青瓷标本中，有一种名为“珠光青瓷”的即是产自宋代同安的汀溪古窑。这个古窑址，1961年被列为福建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同安汀溪的瓷器，当时主要是外销。唐、宋至元代，泉州是中国对外的第一大商港，而瓷和铁占当时泉州一带外销品的大宗。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提到“……泉处之青瓷器”。^[2]《留氏族谱》记载：“陶器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还，民甚称便。”除瓷器外，古代同安的炼铁业



北宋同安窑珠光青瓷碗



南宋同安窑珠光青瓷刻花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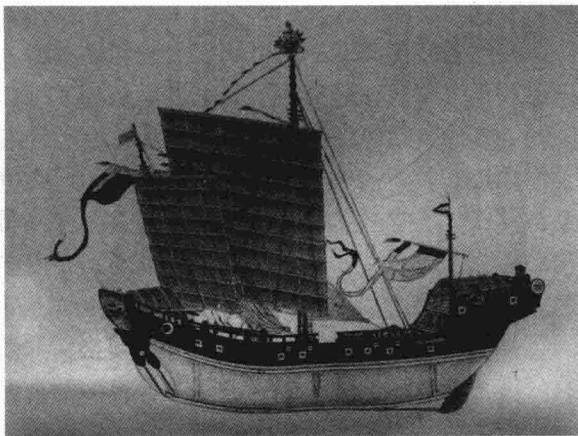
亦十分发达。现存最大的

铁渣堆积城内的葫芦山，仍有古代的铁渣，足见当时炼铁规模大，范围广。公元10世纪，是同安炼铁业的全盛时期。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留从效占有漳泉二州，为军事和经济需要，在同安一带大力发展炼铁事业，除兵器外，大量铸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用于贸易。另据黄任《泉州府志》卷十九《物产志》记载：泉州一带生产的棉布，“五色俱有，而同安梭为佳。”作为泉州府五邑之一的同安，随着泉州港对外交通的发达，也必然有许多人参与对外经商活动而“流寓海外住蕃”。明成化年间

“同安人陈甲，商于琉球。”^[3]

明嘉靖时，福建海上贸易商人纷纷“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收买奇货”。^[4]嘉靖二十一年（1521年）以后，漳泉一带与番舟的夷商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出海商船“往来络绎于海上”。^[5]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一艘福建海商李王乞坐的大船被台风刮到朝鲜，船上的商人有150多人，其中“头人十名”中有同安的高贤、李章。李章上书朝鲜政院曰：“章僻处遐陬，生居同安，人民稠密，寸土如寸金之贵，家室悬壑，炊甑有旧染之尘，兼以往年十月大旱，越春夏不雨，田坼龟纹，野草自焚，饥饿辗转于沟壑，流殍乞丐于道傍，有父子不相顾者矣，有妻子离散矣。菽水之欢，其能几何？无奈买卖造船，经商于外国，营求微利，庶一家朝夕之欢。驾一叶之轻舟，凌万顷之茫然，鲸波浴日，易死而不顾，汪涛浸灭，轻生而突犯。”^[6]



古代厦门海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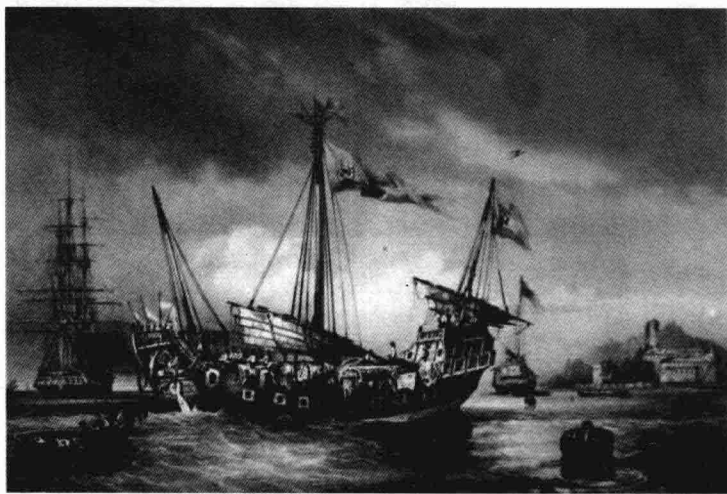
隆庆元年（1567年），由于海商反海禁斗争，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采纳右金都御史涂泽民“议开禁例”的建议，部分取消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但对日贸易仍无开放。中国海商采取各种对策，避开政府检查，扬帆日本，如福建“同安、海澄……等处奸徒，每年四、五月间，告给引文，驾驶乌船，称往福宁，卸载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潜去倭国”。^[7]

天启四年（1624年），同安船主林福载华侨与货物到日本，并在日本与郑芝龙等28人结为生死之交。^[8]明末同安人郑得满《蕃薯序》云：“万历中，同安人有贾于吕宋者，载其蔓置小盆中，归而种之。”嘉庆《同安县志》记载：“贩洋船只，由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至于乾隆初（1736年）为全盛时

期”，所到港口有：“东南至琉球、日本、苏禄、文莱；安南、交趾、占城、港口；柬埔寨、丁机宜（即今马来半岛南部的丁家奴），大崑、大连；柔佛、暹罗、赤仔、麻仔；旧港、噶喇巴、马辰。”^[9]明朝时蔡月湖之女蔡氏其夫许元旅居吕宋，蔡氏则在家乡躬织30余年，兴家立业。又有明代王六娘，其夫陈台宜经纪海外，岁罕得归，后因遇风死于安南。^[10]

1777年，同安的陈天告（Tan Tjan Ko）从厦门往非洲开普敦经商，并娶黑人姑娘桑娜为妻。

嘉庆二十年（1807年），两广总督吴熊光奏称：“有船商金协顺、陈澄发，装载暹罗货物来粤贸易，并请于起货后装载粤省货物赴暹罗。查金协顺系福建同安人，陈澄发系广东澄海人，饬传暹罗贡使询问，据称二船确系由该国新造来粤，因暹罗人不谙营运，所以多雇福潮船户代驾。”^[11]在外国人的记载中也有



1821年同安帆船抵达新加坡港

提到：“有一位名叫杨由的，1807年驾驶‘金协顺’号商船，为暹罗的拉玛二世与中国贸易。”^[12]

清道光元年（1821年），由同安翔风里澳头村开出一艘大帆船，2月18日抵达新加坡港，“这一来，直接从中国移民就开始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华人到新加坡谋生和定居的越来越多”。^[13]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同安县翔风里十三都洪思返等13人远渡印尼苏门答腊，捕鱼为生。同安人随其后移民者日众，峇眼亚比因而逐步开发成一个举世闻名的渔港。翔风里厚平村（今新店和平村）

渔民洪思燃等5人航海到赤礁吧，成了这个拥有人口数万的商埠的开拓者（详见第2章，第1节）。

1869年，同安鼎美祥露乡庄银安去缅甸仰光，初在苏天佑的泰昌号做工，数年后稍有积蓄，自创源记载，向当地政府申请开荒，经营农业。

2. 灾荒、兵乱

福建省自洪武二年至万历四十三年（1369-1615年）246年间，发生旱灾29次，自明永乐十四年至崇祯八年（1416-1635年）219年间饥谨20次。^[14]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封建压迫，使广大农民生活日益贫困。一方面，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满清入关后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土地大量兼并。福建自明朝中叶之后到鸦片战争前夕，粮食大宗进口。这个时期粮食特别紧张，就是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作用的结果。因为“稻利薄”，而其他经济作物“利较田倍”，所以，“往往有改稻田种蔗”或其他作物的。^[15]郭起元《闽省务本节用疏》说：“闽地两千余里……今则草烟之植，耗地十之七八……闽田既去七八，所种梗稻菽麦，亦寥寥耳。”如同安“近年来生齿日繁，山穷采樵，泽竭罢网，‘而米粮’则仰哺海艘”。^[16]明清以来，同安水利失修。嘉庆《同安县志》卷十四《风俗》记载同安县两溪日渐淤浅，大部分稻田只靠壑水灌溉。几天无雨就会发生旱象，而暴雨一来，溪水又泛滥漫淹田园。这种形势使得大量破产农民纷纷随商船出国谋取生计。据《同安县志》载：“曾妈庇，又名广庇，安仁里曾营人。少失怙，家贫，年十四，即赴外洋槟屿操航海业。不利，嗣渡缅甸。”“陈伯屋，字伯富，阳翟人。少分，比壮抵安南，营布商及染料。”“柯祖士，字学优，邑后柯乡人。少业农，频年困于旱潦，谋生乏术，……遂买棹南游，始居噶扣不遇，继旅勝律得遂。”“杜文良，字子山，安仁里黄庄人。十岁而孤，家贫，日与弟弟采薪种地瓜以供母。弱冠，因谋生不易，菽水难与尽欢，乃蓄数百钱为旅费，至厦由帆船渡英属缅甸经商。”1600年，同安人苏鸣岗因生活所迫，“率十数健儿，乘轻舟……至爪哇岛之万丹埠。”1619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第四任总督彼得逊·昆攻占雅加达后，苏鸣岗从万丹带领几百名华侨移居雅加达，对该地的早期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被任命为第一任华人甲必丹。到了1629年，雅加达的华侨已增至2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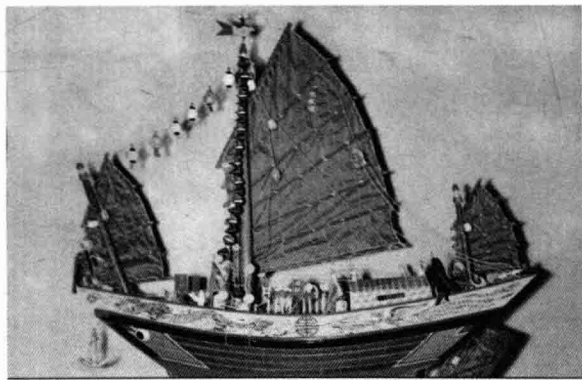
嘉庆《同安县志》卷十三记载：“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年），八月初五日，飓风大作，潮涌数

丈，沿海民居埭田，漂没甚众。……是日，漳泉贩吕宋者数万人，骈首为番僧所杀。”除自然灾害以外，明代倭寇的骚扰也给同安带来严重灾难。嘉靖年间，同安县城被倭寇包围4次，第一次是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第二次是同年五月，第三次是三十八年（1559年）夏，第四次是四十年（1561年）十月，晋南倭集众2万寇同安。林希元在其所撰《邑侯屏台谭公保障记》中提到：“嘉靖戊午、己未（1558—1559年），倭凡再至，焚城外居民数千家，官府傅舍，悉为灰烬。”此外，嘉庆《同安县志》卷九《征抚》中记载，嘉靖卅九年（1560年）四月初二日，倭进攻同安县阳翟。阳翟各乡男女万余人，涌入官澳巡检司城里。城破时，倭纵火屠城，城内积尸几乎和城墙一样高，城外积尸纵横一二里，妇女集体投海不可胜数。明亡后清军南下，“戊子（1648年）屠同安，死五万人。”^[17]严重的兵乱使人民流离失所，自然也向海外谋生。

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廷载可了总督李率泰关于迁移同安排头、海澄方田沿海居民88堡及海澄边境人民安置内地的奏请，^[18]迁界措施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对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造成严重的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界外千百万耕地荒芜，“四海濒海之民，老弱转死沟壑，少壮者流离四方，盖不知几百万人矣。”^[19]据康熙廿二年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四五两卷统计，同安县因迁界而荒废的土地达1941顷，变为虎豹出没之地。“康熙五年，同安有虎患，小盈、新塘大路行人，多为虎所噬”。^[20]同安沿海人民无田可种，无家可归，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流寓东南亚，“顺治年间，福建同安人多离本地往葛喇巴贸易耕种，岁输丁票五六金”。^[21]当时，清廷“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1654年林可行等于同安洪塘“制造双桅违禁海船”，用郑氏（成功）“旭远”印记，由“洪二等新驾出洋”。^[22]



清代同安的“奉旨迁界”石碑



新加坡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同安海船模型

（新加坡同安会馆制作）

鸦片战争以后，厦门辟为“五口”之一，帆船运输受到很大打击，由于外国船夺取中国沿海的航行权利和贸易利益，厦门的出洋和广扒两项帆船，都相继由帆歇业。“遵查闽海关虽分六口，而厦门一口向居税额之半。厦门贩海之船，有透北、过台、出洋、广扒四项货船。自五口通商以后，洋船（外国船）所贩之货，即系出洋、广扒两项船所贩之货，以致出洋、广扒二项船，收帆歇业，因而洋税日增，常税日绌。”^[23]沿海中小型帆船在外国侵略势力实行拒绝保险、强逼护航和洋货免纳子口税3种方式摧残之下，厦门的横洋船由千余只锐

减为四五十只！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折中提到：“漳泉兴化，地皆濒海，居民以海为田，除渔船一项外，多置船为经商之计。近自番舶西来，受载多而行驶速；内地船商之利，遂被侵夺无遗。昔之海坳有船数十者，近则只存数只。”^[24]鸦片与洋货源源入口，使福建白银流失，农业、手工业和航运业遭受严重摧残，造成更多的失业者和贫困者。光绪年间，马巷桐梓村朱姓“三柱头”子嗣纷纷到安南（今越南）西堤谋生。最先到越南的是朱藏新与其父朱来森，家境贫寒，一家7口瑟缩在官口右侧一间破旧小柴房，三餐三继，穷愁潦倒。朱藏新在西堤得到一位在法军当上校的同安人洪某的赏识，逐渐出人头地。朱藏新其兄藏冷及五弟蒲，亦相继到西堤。1878年，西山后林岩山、潘土杨克聿、澳头苏炳普3人结为义兄弟，各披一条麻袋，带几支甘蔗，乘帆船20多天抵安南堤岸谋生。澳头村蒋骥甫自幼家贫，11岁始入私塾就读，至15岁时又因贫辍学，1877年离开家乡澳头村南渡新加坡谋生。马巷镇井头林金殿幼年失学，1892年11岁即抵西贡谋生，后转至新加坡。

宋蕴璞在1930年所著《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一书中指出：“自辛亥以还，内乱频仍，萑苻满地，洪水横流，灾异时闻，农民流离失所，田亩遂多荒芜，此种现象，固不特闽粤为然，惟是闽粤人之移往南洋，已远在唐宋以前，而激增之势，至近数十年始著，则其为生计所迫，复何疑焉？”^[25]

本世纪初，同安县因军阀混战、各踞一方，抓丁派款、鱼肉乡民，更兼土匪猖獗，抢掠烧杀，致使治

安混乱，民不聊生。为避抓丁和土匪抢劫，许多贫苦人民纷纷出国谋生。《同安县志》记载：“十三年（1924年）甲子三月，杨化绍军自泉州来驻南门外、顶溪头，臧致平安自厦移驻西门外瑶江，与杨化绍合。省军周荫人率大军由泉州到马巷，初七日大战于同山七昼夜。杨、臧以子弹尽引兵退。是役也，人民被劫掠至一百五十余乡。”^[26]同安县1829年人口为658964人，到1936年即减少为228260人，少了430704人。^[27]1930年，同安县总户数为18500户，其中农户数13100户，是当时全省统计数字中最少的。^[28]人口锐减，除县辖区范围缩小之外，主要是因天灾人祸大量死亡和外流，其中有相当部分远徙南洋各地谋生。

1925年孙炳炎14岁时即随家去新加坡，他叙述当时离乡的原因说：“家乡的治安虽然不是很坏，但是万一不幸遇到土匪，那就遭殃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旧社会里，强房和弱房的界线分得很清楚，当时强欺弱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再说，我们孙氏人口不多，而且比较忠厚，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就是这个道理。当时我父亲的生意是向别人买土产然后再卖给其他乡村的商人，而且买货时我们得先付钱，但其他向我们买货的商人却常常赖账。我们的账又一定要还给别人，因为我们是弱者，不能拖欠。拳头不比别人大，账又收不回来，生意怎能继续做下去呢？吃亏的还是我们。所以我父亲决定离开家乡，到新加坡谋生。”^[29]

郭芳枫在回忆其离乡出国的原因时说：“我是1912年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同安县一个贫民家庭，早在9岁幼龄的时候，已经能够帮助家庭从事沉重的农务工作。10岁入学之后，追随我的父母亲在田园耕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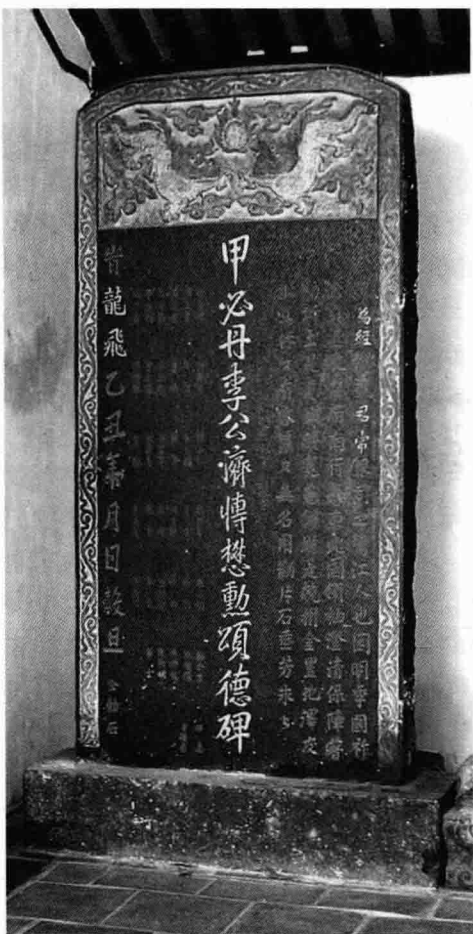
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是在1928年。这一年我离开了私塾，是一个16岁的少年。眼见中国农村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毅然带着一卷草席、一张被单，也带着父母的千言万语的叮嘱，买了一张半价的8元船票，在厦门上船，到新加坡来，开始我一生艰苦奋斗的历程。”^[30]

林云梯不到10岁时，父母双亡，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因挖他人的地瓜充饥而被当作小偷逐出同安，来到厦门当小贩。一次到轮船上兜售油条，因腹泻久呆在船上，轮船启航，正当他急得走投无路时，一位华侨商人收留了他，将他带到菲律宾谋生。

3. 政治流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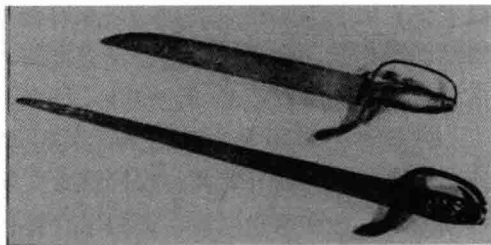
宋以后，政治流亡成了同安人民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元至正十年（1350年），同安爆发农民起义，农民军进攻海滨。^[31]其后果自然是失败而四处流散。明末郑成功抗清，先以同安、厦门、金门为基地，后跬踞台湾与清廷对抗，此段期间，追随郑成功的同安人不少，其中有像陈永华这样杰出的人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是年6月，郑氏兵败于澎湖，郑氏残部不愿降清者皆流寓东南亚各地。郑氏所组织的天地会在海外华侨中传播甚广，天地会“相传延平郡王所设”，^[32]“始创者为郑成功，继续而修整也，而陈近南也”，^[33]“陈近南即陈永华自谓也”。^[34]可见这个时期流寓东南亚的同安人为数不少。

建于1673年的马六甲青云亭，在其



明代马六甲青云亭同安侨领李为经颂德碑

碑铭和神主资料中，记载有第二任甲必丹李为经和第四任甲必丹曾其禄的情况，李为经的碑铭刻有“公讳为经，别号君常，银同之鹭江之人也。因明季国祚沧桑，遂航海而南行，悬车于此……”，而曾其禄神主上有“避难义士”之称号。他们都是



清代厦门小刀会的武器



清代厦门小刀会首领黄位夫妇墓碑

明朝灭亡之际逃难到马六甲的。^[35]近年在马六甲中央医院的后门附近,十几座古墓中发现有二座曾姓甲必丹的墓,墓碑上均有“霞露”二字,“这是指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的厦门(Amoy)”。^[36]

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间(1846-1850年),国内水旱灾荒延及10多个省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便应运而生,一时所向无敌。在其影响下,同安爆发了小刀会起义。闽南小刀会的创始人陈庆真是同安人,出生于新加坡。1851年被清廷捕杀。小刀会骨干王泉等56人也先后被捕。1853年后起的小刀会领袖黄得美、黄位在同安率众起义,占领海澄、漳州、厦门等地,击毙漳州兵备道文秀、总兵曹三祝。黄位称“汉大明统兵大元帅”。清军反攻厦门,经两月激战,厦门失守,黄位退至海上。在其坚持斗争的5年间,曾于1854年、1858年占领台湾鸡笼(基隆),后下落不明,其部成员终身羁留海外,在新加坡垄河西岸的丛林中有一座五虎祠,即其所建。^[37]《福建通志》载:“黄位

窜安南不能获。”据厦大南洋研究所1958年调查资料说,闽南小刀会失败后,有一船从厦门逃往马来亚的起义军百人之多。起义军首领黄位有6个儿子,当时有5个逃居国外。旅居印尼经营糖业的黄仲涵即是黄位的孙子。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1850年7月间在同安陈庆真小刀会起义军中担任过管理军粮和军服装备的军需官。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许多人流落到南洋各国。黄志信与两位兄长黄信卓、黄卓丕从厦门乘船逃到爪哇,后来定居于中爪哇的三宝瓏,在那里经商。因参与小刀会起义而逃往海外的还有同安莲花社人陈玉淡(又名清淡、昭淡),同安盩井社人陈锦奏,还有雍清寿、陈汗等,经槟城至暹罗通扣。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告急,有6起太平军突围,经皖、赣入闽,其中侍王李世贤入漳时,据左宗棠奏报,也有“土匪勾引”。^[38]《福建史稿》载:同安县西乡人民,暗受李世贤的指挥,聚众攻城,牵制

清军后路。聚集最多的,有上宅、浒井、古山、橄榄岭、大乡、外教场、八社半、官浔、林厝塘诸乡,都和太平军有所联络。^[39]因由于此,而招致清军的残酷屠杀。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十二日,清军江苏将领郭松林星夜出兵,冒雨进攻上宅,乘风纵火,全乡毁灭无遗。十四日,到浒井,乡民三四千人踞守山头。郭军用枪炮连环攻击,屠杀1000多人。纵火烧民房,焚毁渔船100多只,被逼投海者不计其数。^[40]

4. 契约华工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来南洋的中国人开始被称为“新客”(Sin-Kh'ehs)(Nieu welingen 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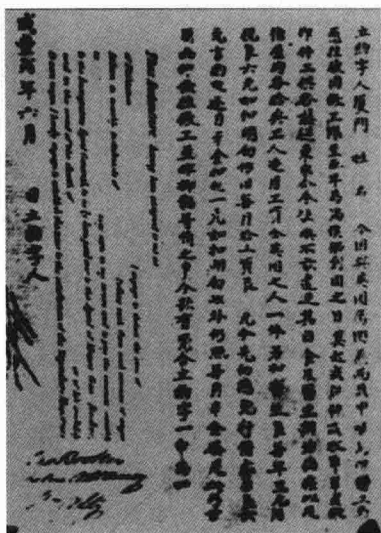
Orangbaru)。1686年,有11艘来自福建的中国商船(其中8艘来自厦门)开到巴达维亚,载来800名劳动者,类此新来的劳动者即被称为新客。荷印政府在1690年、1706年等多次公告中都提到了新客。这种新客最初主要来自闽南地区特别是厦门同安。^[41]

新客都是身无分文的人。他们由中国船带去巴城,由当地雇主或亲友代垫所欠旅费,承诺工作以后偿还。在荷兰殖民者的档案里,经常把这种欠旅费入口的人称为“农奴”,并屡屡出现在荷印政府的公告里。新客因欠旅费而以工抵债,这样雇主与新客之间处于主仆的地位,构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最初新客多由乡亲牵引而来,以后由于生产发展需要大量劳力,拐卖新客随之发生,更有被拐卖为奴隶者。新客在



华工在印尼勿里洞岛艰苦劳动

当时还被称为是一种“特种入口货”(Eig-enaardig invoerartihel), 他们实际上是在一定契约形式束缚下的奴隶。^[42]



华工的卖身契约

契约华工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招募掠夺我国劳动力的一种重要形式,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直到20世纪初期, 持续了100多年。这段时间, 清庭统治腐败无能, 土地兼并十分严重, 经济凋敝, 土匪横行, 封建械斗和宗派争端时有发生。时局的动乱和经济破产, 使得大批农民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拐卖“契约华工”的对象。鸦片战争失败后, 厦门被列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 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中国沿海直接掠夺苦力, 最早始自厦门。1845年, 法国与在厦刚刚开业不久的英商和记洋行(Messrs Syme, Muir & Co.) 经理塞姆(F·D·Syme) 签订贩卖中国苦力的合同。6月, 法船首次从厦门运送180名契约华工经非洲的波旁岛(今留尼汪岛),^[43] 1846年又运去200名契约华工。1847年3月, 2艘英船载有640名契约华工往古巴, 中有同安人林金、李九等,^[44] 其后到古巴的同安人还有叶阿田、林祖爱、林祖受、吴阿垒、庄文明等人。据不完全统计, 1845年至1853年3月从厦门运出的契约华工有18批, 共12261人。^[45] 厦门港阔水深, 大船进出自如, 并有鼓浪屿作为据点, 条件比广州黄埔和汕头更好, 于是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贩卖契约华工的中心。

19世纪中期, 由于美洲和澳洲等地对劳动力的大量需要, 契约华工身价倍增, 以8元代价买来的契约华工能卖100多元, 高额利润使外国政府官员、商人都热衷于这项可发财致富的罪恶勾当。臭名昭著的人口贩子英商德滴(James Tait) 身兼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3国驻厦领事。英商康诺利(Connolly) 原是德记洋行人员, 后升任法国和秘鲁驻厦领事, 也经营贩运苦力的买卖。更有甚者是美商布雷得雷父子甚至为了贩卖苦力不惜花大钱谋取驻厦领事的职业。这些人贩子在厦门设立了“卖人行”和“猪仔馆”:

德记洋行, 1848年设立, 位于鼓浪屿覆鼎山海边; 和记洋行, 1845年设立, 位于鼓浪屿鼓新路, 旧名和记路; 瑞记洋行, 1850年西班牙人设立, 位于仔后; 怡和洋行, 1832年设于广州, 1845年在厦设分行。在定安路炉灰埕和厦门港消防大队附近, 分别设有“猪仔馆”, 用以监禁诱迫来的契约华工。



1840年在留尼汪甘蔗园劳动的中国劳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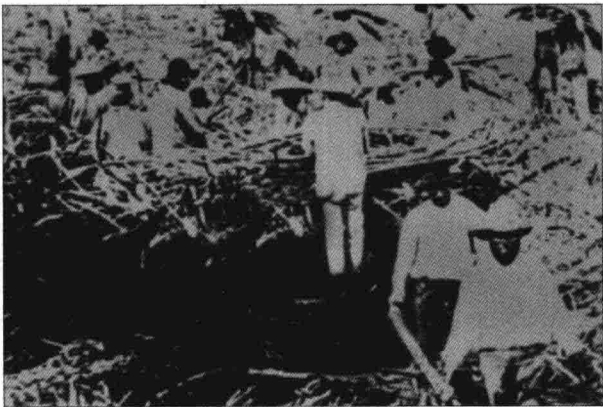
1852年, 包令在致英国外交大臣马姆兹伯利的信中写道: “我曾经在厦门见到装载苦力出洋的办法。几百个苦力聚集在巴拉克里, 个个剥光衣服, 胸前各自按照准备把他们送去的地方, 分别打上C(Cuba, 古巴), P(Peru, 秘鲁), 或者S(Sandwich, 夏威夷)等印记。给他们少许预支金钱以取得填充饥肠的食物, 一套遮蔽裸体的衣服, 一两枚银元留给他们的家属, 便可得到无数人应招出洋。”^[46]

1852年从厦门出洋的罗福安等17人提供的证词, 可以说明契约华工并非“自愿出洋”, 而是被拐骗的, 这17人中有永安的陈来……厦门的陈得利、周有、同安的张海……他们都说是被洋行所雇客头拐骗上船的。^[47] 这个时期被拐骗作为契约华工的有姓名可查的同安人见下表,^[48] 被拐骗的还有全省各地的人, 甚至还有其他省份的人, 但危害最大的还是闽南一带。

《古巴华工事务各节》记录的被拐骗的同安契约华工姓名表

姓 名	籍 贯	职 业	去国时岁数	出国年代	出国原因
苏阿海	同安	渔	32	1846	在厦门卖鱼时被绑架
叶 田	同安	农	20	1852	父死母嫁以推荐做事被骗卖
郭 占	同安	小生意	38	1852	卖货时被诱入屋内锁住
林 德	同安	农	14	1857	外出找叔父，半路被捆
陈 水	厦门	水手	26	1858	请当水手，到岸被卖
陈 真	厦门	小买卖	21	1869	招出洋做工，骗说不是卖身
陈 成	同安	农	42	1869	诱说出国做工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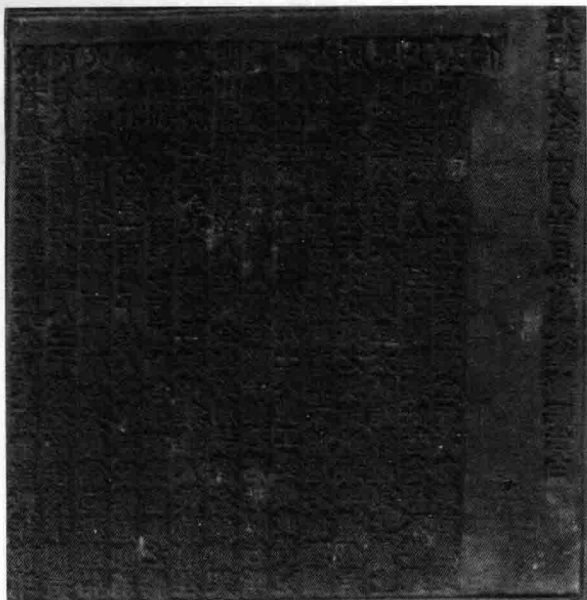
1852 年 11 月 21 日，和记洋行的一名拐贩被民众抓获，送交参将衙门。这事很快被和记老板英人辛梅获悉，立即赶到衙门要人，并藏在自己家中。消息传开，激起民众愤怒。22 日，厦门全岛商铺罢市以示抗议，并以 18 保民众的名义张贴告示，要和记洋行交出拐贩，否则将断绝与和记、德记洋行的经济来往。但和记洋行对此置若罔闻，24 日，民众 1500 多人汇集在和记洋行门口示威。英国军舰“萨拉门特”号水兵前来镇压，开枪打死 8 人，重伤 16 人。清政府地方官吏仰洋人鼻息，诬蔑民众“滋事斗殴”，出动军队镇压，示威斗争被平息。



1900 年在夏威夷甘蔗园劳作的契约华工

1869 年初，在厦门的西班牙领事骗招 690 名华工前往古巴，分两船于三四月运走……，许多受害家属纷纷提出申诉。同安县民邵陈氏禀称，四代惟遗的胞弟被诱拐，假名胡福，虽年已 42 岁，仍被假年为 36 岁。^[49] 1869 年 2 月 25 日苦力装船运出厦门时，“居民盈千数百伫立怒视，伤心坠泪，痛骂不休”。^[50] 同月，同安山坪乡王念被绑架下船，村民闻呼救声前往救出，并将该小船毁坏。^[51] 外国殖民者还挑起“附近各乡村械斗，残毁百姓”，^[52] 战败一方亦被掠出洋。在金门、同安、海澄、漳浦一带，还不断有人被“海盗”绑架贩卖出洋。在厦门一带从事渔业的渔民，则“从小船上被掳走，而这些作为拐子手疯心狂野心的牺牲品的人们，却正是他们家庭的支撑者，因而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53] “整个厦门和附近地区的居民，都认为这是一种共同的祸患”。^[54] 后来，这种诱拐竟发展到公开绑架。英国的一位官员描述当时的厦门说：“甚至于在白天的厦门大街上，没有一个男人在出门时不冒着被人以欠债或犯罪为借口而强行拖去，落入人贩子手中的危险。”^[55] 诱拐不行即施用绑架，其风极盛，使得清朝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告示禁止：“为严禁事，照得厦门地方访闻，沿河一带，近有凶悍棍徒，乘人不备，用棍力击其颈背，使人昏迷倒地，即系缚手足，用船载出大担，重价卖与外洋，行事多在昏夜，及外来乡民，深被害事”，“亟应密速拿办，以清地方”。^[56] 据统计，在 1886 年至 1917 年这 31 年中，每年从厦门出国去新加坡、马尼拉、台湾、香港等 4 处的移民人数至少达 65000 人以上，最高年份达 126000 多人，足见西方殖民者掠贩华工的猖獗程度。

清光绪丁亥年（1887 年）香港东华医院刻板印刷宣传传单、告诫华人抵制“契约华工”贸易、慎防上当受骗前往北美洲巴拿马。印版全文如下：



1887 年香港东华医院传单刻板

启者刻接巴拿马埠华安公司来函备言，数年前埠内有人在厦门招集华人三千余名前往该埠开造火车路，时甫兴工猝遭瘴疠殒命者，几为殆尽，连带病概计谨存者一百七十余人，该东见此惨迫即将载往别埠调医方免此厄，历计各埠有患瘴疠之惨莫甚于此。迄今又闻该埠再欲招集华人数万前往开山通海（开凿巴拿马运河），托词招人往旧金山或别埠为名，种种架词难于枚举，其实骗人直往该埠，如若落船开行断难图脱，历查以前开海具用土人做工，受惯此苦，竟亦有猝中暴亡或头肿脚软者指不胜屈，考地理图所载巴拿马埠在天地交界之深坑地最卑湿，位居东南，冬夏不分、雨水无间且太阳酷烈、湿气上腾、上下相感，若我华人聚至此间，难堪此苦，安得不猝遭暴亡，当为前车之鉴，望诸君预宜猛省，勿蹈危机。此布。

光绪丁亥年四月吉日抄刻 东华医院告白

东华医院位于香港上环普仁街，是香港开埠以来历史最悠久的三大医院之一，1872 年医院落成后取名“东华医院”。东华医院也是香港最早的华人慈善机构，医院由华人捐献财物及政府资助经费支撑运营，并由董事局监管。东华医院成立初期，它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是华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有名望的绅商或华人领袖。当时该院雕刻印版所印的宣传传单应是由报童在公共场合散发、随报奉送或者贴在墙上，揭露了外国殖民者进行“契约华工”贸易的陷阱，挽救了相当数量的华人生命。

1843 年，毛里求斯甘蔗园主英国巴克莱兄弟公司和法国吉魁特公司，通过槟城英商勃朗公司和新加坡英商斯波蒂伍德·康诺商行“招雇”到 838 名同安厦门籍的农业契约工，契约期一年。^[57]

1848 年到 1853 年 1 月，从厦门运往澳洲悉尼的契约华工共有 15 船 3588 人。

1860 年，中国第一个女性移民白文，乔装商人秘密来到毛里求斯，她是同安厦门人，其时 22 岁。

同安竹坝华侨农场的印尼归侨中，有 20 多人早年曾卖身出洋。他们大多原籍广东，因生活贫困，卖“猪仔”到印尼邦加锡矿当矿工：

邓炽，广东省广陵人，1936 年 29 岁时，到邦加锡矿海上挖矿船做工。

罗国振，广西玉林人，1937 年 23 岁时，从香港到印尼邦加沙横一号矿。

刘辉，广东阳山人，1937 年 19 岁因逃壮丁先到九龙做工，1940 年到邦加 5 号炭山。

罗年，广东人。15 岁时因家贫到香港做工，1941 年他 21 岁时，被卖“猪仔”到邦加锡做工，同一批有 300 多人。此外，还有罗进才、周兴、周荣等人，也在同一时期先后被卖“猪仔”到印尼邦加锡矿做苦工。

从道光二十一年到民国 38 年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华侨出国人数与规模的变化有 3 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清道光二十一年到光绪十六年（1890 年），华侨出国人数与回国人数同步增长；第二个时期从光绪十七年到民国 19 年，是华侨出国的高潮期，出国人数迅速增长；第三个时期从民国 26 年至民国 38 年，华侨回国人数两度超过出国人数。



胶农在亚答茅寮中加工胶片

1875 ~ 1949 年厦门口岸出国人数情况表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875	18996	1887	55880	1899	66276	1911	86840	1923	69271	1938	33929
1876	22764	1888	61638	1900	90625	1912	97572	1924	76578	1939	17945
1877	22871	1889	56351	1901	79399	1913	72196	1925	86154	1940	18126
1878	25723	1890	54282	1902	85673	1914	56674	1926	222922	1946	7343
1879	17945	1891	57760	1903	78231	1915	41012	1927	94536	1947	42871
1880	18677	1892	56343	1904	75537	1916	72839	1931	37686	1948	40757
1881	31190	1893	56951	1905	59178	1917	52820	1932	36121	1949	24882
1882	50138	1894	61245	1906	72342	1918	36123	1933	26973		
1883	36154	1895	81080	1907	76166	1919	46058	1934	35604		
1884	47370	1896	58284	1908	52121	1920	62405	1935	40037		
1885	37626	1897	42706	1909	46336	1921	78656	1936	50682		
1886	51250	1898	57634	1910	80071	1922	56984	1937	73007		

注：表中缺 1928 ~ 1930 年出国人数。

1969 ~ 1995 年经厦门出入境的华侨、华人情况表

年 份	出国人数	回国人数	年 份	出国人数	回国人数	年 份	出国人数	回国人数
1969	98	93	1978	1656	592	1987	764	5051
1970	86	112	1979	299	834	1988	501	10605
1971	189	266	1980	1174	2120	1989	823	1667
1972	539	32	1981	963	2207	1990	583	8275
1973	450	1368	1982	312	2247	1991	298	6274
1974	258	2190	1983	273	3049	1992	312	8160
1975	142	898	1984	180	3552	1993	321	4062
1976	264	212	1985	438	4992	1994	272	4489
1977	440	181	1986	437	4834	1995	555	4493

同安人出国谋生除以上经济、政治主要原因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地理、气候的因素，宗族、乡亲、朋友、戚属的互相提携，相随外出。同安华侨大多聚居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新、马、菲，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原籍同安的新加坡华人学者杨松年，根据新马华文文学作品的作者叙述他们本身以及作品中人物离别故乡到南洋的资料，对于华南人民南迁的原因，归纳为以下 7 点：

- 1. 家乡兵匪骚乱，民不聊生；
- 2. 在家乡犯罪，不能立足；
- 3. 纯粹羡慕南洋“遍地黄金”，为求取财富；
- 4. 参与军事反抗，斗争失败，唯恐被捕；

- 5. 天灾人祸的促使；
- 6. 家庭惨变，心灵破碎；
- 7. 因为南洋有亲友的关系。^[58]

据中国太平洋学会在 1934 年 9 月至 1935 年 4 月，对闽南粤东的 10 个县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对所访问的 905 家家庭分析，结果如下表。^[59]

出国原因	户 数	百分比
经济压迫	633	69. 95
南洋的关系	176	19. 45
天 灾	31	3. 43
企业事业的发展	26	2. 87
行为不检	17	1. 88
地面的不靖	7	0. 77
家庭不睦	7	0. 77
其 他	8	0. 88
总 计	905	100

可见经济上的原因是促使闽粤华人大量出洋的主因。同安人出洋谋生的原因亦带有这种普遍的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秩序逐渐安定，加上东南亚各国开始限制移民入境，因此出国人数便日趋减少，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初期只有少数侨眷获准移居东南亚各国与亲人团聚，其后便基本上停止，特别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华侨大量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

1949 年 10 月 17 日厦门解放。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2 年 8 月的近 3 年中，经厦门出国的移民人数只有 9574 人，大大少于解放前。直到 60 年代，除到海外继承遗产或家庭团聚等原因重返居住地的归侨、侨眷外，出国定居的新移民仍然很少。

1971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后，经厦门出入国的华侨、侨眷慢慢有所增加。1978 年，国务院批准执行《关于放宽和改进华侨、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从 1978 年起，华侨、侨眷出入国人数明显增加。1988 ~ 1995 年，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居民出入国定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

二、地域、分布

嘉庆《同安县志》记载：厦门港的贩洋船只，由雍正五年（1727 年）开始，至乾隆初为全盛时期，所到港口很多：琉球、日本、苏禄、文莱；安南、交趾、占城、港口；柬埔寨、丁机宜、大崑、大连；柔佛、暹罗、赤仔、麻仔；旧港、噶喇巴、马辰。^[60]



华人街贩和金饰匠蜡像(菲律宾博物馆)

《厦门志》记载：贩洋船开往东南亚，冬去夏回，一年一次。^[61]“据十闽之要会，通九泽之番邦”。^[62]

古代华侨所分布地域有：麻里老屿、吕宋交溢、米六合、苏禄、文莱、交趾、占城、昆仑、暹罗、吉兰丹、六坤、彭亨、柔佛、马六甲、亚齐、詹卑、旧港、下港、吉宁马礁、马辰、勿里洞等地，在今之菲律宾、摩鹿加、北婆罗洲、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泰国、婆罗洲等东南亚一带。

契约华工的分布，除了东南亚一带外，还有古巴、秘鲁、夏威夷、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远至非洲的毛里求斯、圣海沦那、开普敦、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和塞内加尔。

近代和现代同安华侨、华人的分布，据 1981 年调查，分布在如下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东帝汶、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缅甸、泰国、老挝、印度、美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多米尼加、英国、荷兰、瑞典、挪威、丹麦、新几内亚。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

第二节 人口、职业

同安华侨的人口，历来缺乏精确的统计资料，更无法从现有的各国各时期闽籍华侨、华人的人口统计数字中分析出来，还有待调查。

根据西班牙殖民政府 19 世纪 90 年代人口统计资料，马尼拉集中了全菲华侨人口的一半以上，约 5 万人。怡朗有 2010 人，宿务 1447 人，卡加延 1107 人。从这 4 个华侨聚居地的人口统计资料抽查显示，80% 华侨来自福建晋江、同安、南安和龙溪 4 个县。其中晋江（包括泉州城）华侨占闽籍 50%，往下比例顺序是同安、龙溪（含漳州城）和南安。^[63]

1880 年，在越南堤岸有同安帮的社团“悦轩公司”，其时在堤岸的同安人有 4000 人。^[64]

1931 年，新加坡同安会馆会员约 300 多人。

1936 年，缅甸同安会馆会员 1500 多人。^[65]

1947 年，马来亚雪兰莪巴生五条港岛上人口的 18% 是同安人。

1965 年，新加坡同安会馆会员 1100 多人。

1973 年，马来西亚檳城同安金厦公会会员 663 人。

1980 年，马来西亚巴生雪兰莪同安会馆会员 500 多人。

1983 年，马来西亚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会员 1000 多人。

1984 年，马来西亚巴生雪兰莪同安会馆会员 700 多人。

1985 年，新加坡同安会馆会员 950 多人。

这些零星资料中的人数远不是各地当时的同安籍华侨、华人的准确人数。香港中文《亚洲周刊》驻新加坡资深特派员、同安籍华人学者蔡良乾指出：“马来西亚人口约有 1500 万，新加坡有 260 万。但由于新马华人在填报出生、入学及就业登记时，于 60 年代起已无填写祖先籍贯的习惯，因此要确实统计新马到底有多少人原籍是福建省同安县并非易事。不过，估计两国如今至少会有 20 万祖籍同安的华裔。”^[66]

根据民国 37 年（1948 年），同安县府调查统计，同安人侨居南洋各地者占全县人口总数 3/10，约 75000 余人。

1957 年 12 月 31 日，福建省统计局统计：同安县人口 232202 人。海外华侨约有 70000



新加坡的土生华人

人，占全县人口 30.14%。这 70000 多人中，其中新、马占 50%，35000 人；越南占 30%，21000 人；印尼、缅甸、菲律宾、日本、荷兰占 10%，7000 人；其他地区 10%，7000 人。^[67]1981 年全县普查，旅居海外的同安籍华侨有 9436 户 127438 人，分布于 23 个国家，而居住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占 99.23%。

1981 年全县普查统计：旅外同安人具体分布如下表。^[68]

1981 年同安县侨情普查统计表

国家或地区	户 数	人 数	国家或地区	户 数	人 数
新加坡	2672	49217	日 本	7	43
马来西亚	2465	39035	西 德	5	53
越 南	1261	11258	沙捞越	6	33
印 尼	1048	10336	瑞 士	4	21
菲律宾	451	5333	新西兰	2	12
柬埔寨	285	2633	英 国	2	10
緬 甸	250	2590	印 度	1	7
泰 国	107	1200	荷 兰	1	10
美 国	63	385	瑞 典	1	8
加拿大	25	146	挪 威	1	8
法 国	9	80	丹 麦	1	7
澳大利亚	11	58	香 港		
老 挝	10	65	总 计	9436	127438

1997 年，同安县侨务办普查统计，全县旅外华侨、华人共 13367 户 152233 人，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各国。其中新加坡 6034 户 65695 人，马来西亚 4817 户 56542 人，两者合共占同安旅外华侨、华人总户数的 81.18%，总人数的 80.30%。

2005 年同安区侨情普查，旅外华侨、华人计 1773 户 35781 人（其中华侨 409 人，华人 35372 人），分布于 21 个国家。其中属于东南亚九国的华侨华人共 31903 人，占 89.16%。

2005 年旅外同安人分布表

国家或地区	人 数	国家或地区	人 数
新加坡	12928	法 国	249
印 尼	3303	德 国	189
马来西亚	8719	英 国	134
緬 甸	2249	老 挝	82
菲律宾	1878	瑞 士	60
美 国	1867	日 本	53
越 南	1032	丹 麦	31
泰 国	1002	印 度	23
柬埔寨	710	瑞 典	13
加拿大	541	新西兰	8
澳大利亚	301	合 计	35372

2005—2006 年度,翔安区侨务部门根据福建省侨务部门的统一布署,开展“全省重点侨情调查”工作,调查统计表明,翔安区有旅外华侨华人 80237 人,归侨 877 人,侨眷 60285 人。但是据 1982 年的分镇统计数字,今翔安区所属五个镇的华侨华人人数为 76645 人,23 年间只增加 3592 人,显然该次调查统计因为条件的限制还不够深入全面。

鸦片战争之前出国的同安华侨,绝大多数从事商业、航海或其他体力劳动。早期华侨多从事商品零售、土特产收购、货物运输、日用品制造和修理、垦荒、采矿、蔬菜栽培。少数从事岛陆贸易或充当翻译、医生或代办商。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由于“契约华工”的产生,一些同安人在国外的矿山、种植园或建筑工地做苦工,少数当店员、小贩、苦力或其他服务性行业。工商业家在此段期间渐露头角,主要集中于商品零售、土特产收购、土法采矿、碾米、锯木、内河航运、城市服务等行业。

1861 年间新加坡行政官华汉 (J·D·Vaughan) 曾在一本书中详细列出当时华人的各种职业,“华人可以说无所不能,他们是伶人、卖艺者、艺术家、音乐家、药剂师、书记、管账、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员、传教师、僧侣、医生、教员、客栈主人、屠夫、猪肉贩、胡椒和甘蜜种植者、糕贩、牛车与马车主、布贩、酿酒者、食物店主、鱼贩、生果贩、渡船夫、卖草者、小贩、商人与代理、油贩、鸦片馆主人、当铺商、售猪商、家禽商、米商、船具商、店员、洋货商、酒店主人、仆人、木材商、烟草商、市场果圃人、劳工、烘面包者、磨场主、理发师、铁匠、船夫、装订书者、鞋匠、砖窑匠、木匠、家私匠、马车匠、修车匠、牛车与马车夫、烧炭者与炭商、棺材匠、糖果商、包工与建筑者、桶匠、司机人与



20 世纪初吉隆坡的人力车



华侨开设的同安堂药店



20 世纪初华人力车夫的估俚间

伙夫、金匠、枪匠与锁匠、煅石灰者、泥水匠、席与篮编织者、制油商、矿商、油漆匠、灯笼匠、脚夫、磨豆者、印刷商、石匠、制糖者、裁缝师、制皮匠、洋铁匠、黄铜匠、制阳伞者、承揽殊葬者与墓碑匠、钟表匠、挑水者、樵夫与火柴商、雕木匠与象牙匠、相命者、杂货商、乞丐、流氓与小偷”。^[69]

据民国 13 年 (1924 年) 槟城学者林博爱主编的《南洋名人集传》(槟城点石斋印刷承印),载有南洋各埠各行业华侨名人 3045 人,其中同安人 (含思明、金门、厦门) 671 人,占 22%。

编号	姓名	籍贯	字号	行业/职业	活动地区 (商号/公司)	官方职衔	册	页
9	白玉堂	福建思明	字锡荣	经理	荷属瓜哇 (丰顺号); 槟城; 太平 (丰顺棧)		2 下	182
14	蔡抱汉	福建同安	字抱汉		槟城; 安记号		2 下	260
30	蔡嘉钟	福建金门		树胶土产业	新加坡 (长发号; 蔡嘉钟肥皂公司)		5	171

40	蔡妙娘	福建同安				4	179
43	蔡木生	福建金门		司理	星洲（合通号）	5	124
53	蔡水湖	福建厦门		商业；航业； 鱼干什土产业	新加坡、 仰光、安南（福兴行）	5	35
55	蔡天从	福建同安	字育仁	销售货物	星洲、巴城（福同源号）	4	75
68	蔡耀明	福建同安 生于新加坡		船主		5	194
69	蔡仪卿	福建同安			星洲；日福同源	2 下	109
75	蔡月皎	福建同安		树胶土产业	新加坡 （新再春号；谦成公司）	4	132
86	车德源	福建思明	字渊鉴	牧师；校长	麻坡；教会学校	2 下	315
91	陈宝臣	福建思明 生于越南 菩萨埠	字美伦	簿书	新加坡；大商店	2 下	296
94	陈宝脾	福建同安		椰油业；畜牧业； 杂货业	马来半岛（万荣成）； 半港（万成美杂货号）； 沙峇（顺记）	4	118
103	陈苍术	福建同安	名水卒； 字苍术	实业	铅里	1	213
105	陈超炎	福建同安			棉兰	2	107
107	陈成木	福建同安			甲抛旁勝峇底； 合美志利；胶田	2 下	350
116	陈赐曲	福建同安	字致奇			4	36
117	陈赐曲	福建同安	字致奇	树胶业	麻坡（集记号）	4	36
119	陈存心	福建同安	名存心	商业；什货业； 胶业	吉礁；高搭埠	2	54
127	陈东岭	福建思明	字秀松	瓷器业	星洲	2	97
130	陈端麟	福建同安	字玉书	农业；书报业； 商业	贯川（农会）；星洲	1	52
131	陈恩勉	福建同安		种植业	马六甲（金和春号）； 柔佛振林山（龙美山公司）	5	178
134	陈芳岁	福建金门县		商业；儿童教育	新加坡（新成发板柴商业）	1	38
136	陈凤毛	福建同安 生于新加坡		杂货油米	新源兴号	5	181
137	陈扶持	福建同安		板木屋料业	王家山脚（福林号）； 甘光加波亚纳峇实得力 （陈福林号）	4	128
142	陈庚辛	福建同安	字子金	商业；经纪	新加坡（陈嘉庚公司）； 吧双坡	4	93
143	陈庚辛	福建 同安集美	字子金； 号天清	经理	缅甸属之良党埠； 新德兴商号； 新加坡；陈嘉庚公司； 巴双埠（里记土产什货号）	2 下	257
150	陈贵贱	福建思明		商人	新加坡； 新协兴商号；再兴材店	2 下	113
151	陈贵贱	福建思明		汽机业；板柴业	新加坡（再兴号厂）	5	87

158	陈国珍	福建思明	名珠盘	硕莪业	新加坡（建安硕莪厂）		4	32
161	陈海松	福建金门	子大森	木业；胶业	新茂林板厂；		2 下	162
163	陈汉庆	福建思明		磁器业	星洲（同成磁器号）； 同发成号；马六甲， 宁宜（乳树园）； 马六甲（成栈）		2 下	118
164	陈汉玉	福建思明		酒业	槟榔屿（福南虾煎铺）		1	122
182	陈嘉庚	福建同安		商业；种植业	星洲（谦益）		1	199
185	陈介民			医药业；益丰 日报营业部帮事	马株（利民药房）； 吉隆坡		4	47
186	陈金成	福建金门	名炳坤； 字金成	商业	马六甲		1	147
187	陈金川	福建同安	字玉如	司理	新加坡 （陈嘉庚公司，林金殿船厂）		5	189
188	陈金斛	福建同安			吡叻属之高楼（瑞利公司）		5	357
190	陈金怀	福建金门		薪柴业	巴生埠；金联发		2 下	328
195	陈金培	福建同安 生于新加坡		运输业			5	287
196	陈金书	福建思明 生于新加坡		航海业			5	73
197	陈金秧	福建同安	字锡畴	商业	实叻坡（竹安号）		1	139
200	陈金镇	福建同安		面粉业； 土产货业	新加坡（陈协裕；硕莪廊）		5	99
201	陈金忠	福建思明	字文谋	米郊经理	檳城；新加坡（陈嘉庚公司）		5	338
203	陈锦波	福建思明 生于新加坡		商业	新加坡（振声）		5	336
205	陈进来	福建禾山		贸易土产 出水配莲	新加坡（通和号）		5	53
207	陈景兰	福建金门		簿书；	新加坡；协成号；勿里洞； 南金号；新加坡；号成源； 星洲芽笼硕莪厂泰源； 逢源公司		2 下	143
217	陈可进	福建金门生于 双加兰埠			金源春店		5	351
218	陈恳	福建同安		划船业	新加坡		1	145
221	陈乐水	福建同安			新加坡； 麻坡（陈嘉庚公司分行）		4	67
237	陈妙生	福建思明			仰光埠；新永联号		2 下	335
238	陈民情	福建思明			檳城；宝成商铺；钟灵中学		2 下	283
244	陈母 张太君	福建同安		商业			2 下	11
248	陈能显	福建思明		商业；公司经理	雪属巴双坡 （陈嘉庚公司）；檳城		4	135
250	陈期宰	福建金门		材业；轮船； 屋宇；胶业	新加坡；张金兴利号； 柔佛（峇株巴辖）；		2 下	147
252	陈其矸	福建同安		树胶业	麻六甲；协泰商号； 泉泰酒庄；余发齐酒号		2 下	158